

*Xingwei Jingjixue
Lilun yu Kuozhan*

行为经济学 理论与扩展

刘凤良 周业安 陈彦斌 于泽◎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人民大学“985”项目资助

行为经济学

——理论与扩展

刘凤良 周业安 陈彦斌 于泽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扩展/刘凤良，周业安，陈彦斌，于泽等著.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8

ISBN 978 - 7 - 5017 - 8533 - 9

I. 行… II. ①刘… ②周… ③陈… ④于… III. 行为经济学 IV. F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728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张晓楹 许秀江（电话：010 - 68319290 xxj09@163.com）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白长江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5017 - 8533 - 9/F · 7524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12390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41878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中反新古典阵营中涌现出一股反思理性的思潮,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原本以“心理学和经济学”这样松散名称而出现的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并冠名为“行为经济学”。这场理论革新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卡托纳(George Katona)20世纪40年代对宏观预期的分析,而1978年西蒙(Herbert A. Sim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可以看成是这场思潮涌动的标志,后者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下的决策科学直接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西蒙本人更是认为,包括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内,康芒斯(John R. Commons)、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托纳(George Katona)、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温特(Sidney Winter)等人都可以称之为行为决策论者,而制度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也被认为是早期行为决策研究的正统方法。

继卡托纳和西蒙之后,许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手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并试图建立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经济学家特维斯基(Tversky)发表了一系列令人震撼的研究成果,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他们以效用函数的再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

择模型，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

与许多非主流的经济学思潮一样，行为经济学是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而获得进步的。一般认为，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方法论上，反对弗里德曼等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经济学的假定必须要以现实为基础，特别是关于人性的假定必须要符合心理事实。第二，在理论内核上，反对偏好的外生性，主张偏好内生化；反对完全理性，主张有限理性；反对经济人假定，主张趋社会性的人性假定（即必须考虑人的利他、感情、直觉等方面）。第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反对单纯的大样本计量检验，主张采取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等小样本研究方法。行为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理论创造过程中，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前提、理论形成以及结果检验三个方面都应该有所革新。在理论前提上，行为经济学认为，应该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组织理论、决策科学的成果，以增强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在理论形成上，应该更强调解释真实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分析行为可能发生的逻辑条件；在理论结论的检验上，应该吸收更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比如利用调查和实验室数据进行的分析。

基于上述判断，行为经济学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丰富的行为假定，考察由这些行为假定所刻画的经济当事人如何调整最优决策方式，从而如何影响均衡结果。其核心观点是，经济学要研究经济行为，而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而不是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之上；现实的心理特征表明，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它们的决策目标具有相对性，

前　　言

而决策程序往往依靠启发式和框架等完成；在决策过程中，当事人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市场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受到质疑，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由于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更贴近实际经济过程，也更具有解释力。

由于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均衡过程分析等理论内核，同时用广泛的符合心理特征的假定条件来代替标准的假设，拓展了原有新古典理论对一些“异常”现象的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检验了标准理论的预测力，因而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引领的行为经济学思潮在经历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排斥的局面之后，20世纪90年代迅速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并逐步吸引了众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行列。其中包括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Reinhard Selten)、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Vernon Smith)，以及1999年度克拉克奖获得者史莱弗(Andrei Shleifer)、2001年克奖得主拉宾(Matthew Rabin)。目前，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渗透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其中包括以拉宾、斯塔玛(Chris Starmer)为代表的行为决策理论；泽尔腾、卡梅瑞(Colin F. Camerer)、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等人涉及的行为博弈与产业组织理论；伯格(Nathan Berg)、比利(Truman F. Bewley)为代表的行为劳动经济学；阿克洛夫、莱伯森(David Laibson)等人研究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史莱弗(A. Shleifer)、塞勒(Richard H. Thaler)等人为代表的

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扩展

行为金融;以及与公共政策有关的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和行为公共财政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行为经济学的进展,并成立了以刘凤良教授、周业安教授、黄淳副教授等为主要成员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伴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彦斌副教授、于泽博士、李彬博士(现中央财经大学)、张海阳博士(现农业部农研中心)、高东明博士(现中国银行)、江艇博士(现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等一批年轻学者纷纷加入其中,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分别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各方资助。本研究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围绕着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框架、行为决策理论、行为劳动市场分析、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金融理论等五个方面组织内容,试图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对比的同时,凸显行为经济学的特点,并体现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扩展研究。具体撰写人如下:第一章和第二章,周业安;第三章和第四章,于泽、黄淳;第五章,周业安、章泉;第六章,周业安、宋紫峰;第七章,刘凤良、李彬;第八章,李彬、刘凤良;第九章,陈彦斌、周业安;第十章,周业安、陈彦斌。除了执笔人之外,我校西方经济学专业的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课题组的文献研读和讨论,教学相长也贯穿于该项目成果完成的整个过程。

中国经济出版社许秀江博士以及他的同事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课题组深表谢意。

刘凤良 周业安

2008 年 1 月 10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1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和行为经济学 的产生背景	1
第二节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背景	7
第三节 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和发展	18
第四节 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28
第二章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	35
第一节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	35
第二节 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近的发展	43
第三节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	58
第三章 行为风险决策理论	71
第一节 期望效用理论	73
第二节 对独立性公理的挑战和应对	77
第三节 非传统决策理论	84
第四节 “被发现的偏好”假说	92
第五节 脑神经经济学的初步启示	109

第四章 行为风险决策理论的一次探索

——理性偏好逆转 111

第一节 引言 111

第二节 模型解释 114

第三节 对特维斯基、斯洛维奇和卡尼曼实验数据
的解释 121

第四节 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124

第五章 行为劳动供给理论 131

第一节 标准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 132

第二节 行为劳动经济学的劳动供给观点 139

第三节 结论 144

第六章 工资决定的行为与制度分析 147

第一节 引言 147

第二节 工资决定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证据 149

第三节 工资决定中的行为和制度因素
的相互影响 155

第四节 行为偏好、制度和工资激励——工资决定
的行为和制度分析框架 158

第五节 结论 163

第七章 行为消费理论 165

第一节 引言 166

第二节 行为消费理论的理论贡献 168

目 录

第三节 行为消费理论的政策含义	177
第四节 结论	181
第八章 验证性偏见与货币政策效果	185
第一节 引言	185
第二节 带有验证性偏见的总供给模型	191
第三节 货币政策效果	196
第四节 结论	204
第九章 行为金融(I)——行为资产定价	207
第一节 引言	207
第二节 行为资产定价一般均衡框架	213
第三节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具体讨论	218
第四节 结论和展望	234
第十章 行为金融(II)——行为公司金融	239
第一节 引言	239
第二节 金融契约的传统模型	243
第三节 理性约束下的公司投融资决策	252
第四节 公司金融理论的契约层面和行为层面	261
参考文献	264

第一章 导论——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和行为 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经济学是关注现实还是关注一个抽象的世界？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争论已久的基本问题。按照史库森的说法，弗里德曼概括了经济学家关于理论和历史的三种方法论观点，如下图所示史库森（2006, 第 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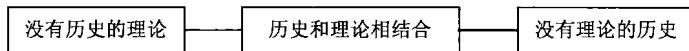


图 1-1 三种方法论观点

没有历史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崇尚康德的哲学观，强调经济学研究只有演绎推理方法才是可信的，反对任何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就是根据人的主观偏好和行为的内在逻辑构造出一整套公理体系，然后由该公理体系出发，推演出各种具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可能的后果，从而形成对经济体系的正确理解。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对事实的观察，而是来自基于人类根本行为的演绎推论。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作为科学，其定理就不能通过具体的经验事实加以证伪。从而，

米塞斯反对任何形式的证伪工作,包括对计量经济学和数理模型的运用。^① 米塞斯的这种方法论思想准确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潜藏的方法论逻辑。尽管在对待数学工具的使用上,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但即使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工具纳入,如早期萨缪尔森等人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从本质上看,演绎方法还是被推到了一个极致。

按照史库森的分类,与米塞斯方法论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两个学派崇尚经验证据,注重从现实中提炼理论,但缺乏一个合理的可供演绎的逻辑体系。这两个学派都认为,经济现象千变万化,并不存在某种有规律的东西,科学的研究只能针对某些具体环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然,这种方法论不可能称其为科学化,所以科斯在后来说得比较刻薄,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可以一把火烧掉,因为它们对经济学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②。处于中间的就是芝加哥学派。即强调演绎方法,同时注重历史对理论的检验。其中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最好的阐释(Friedman, 1953)。弗里德曼是推崇演绎方法的,所以他才强调,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并不构成经济学科学化的关键,真正核心的问题是理论本身是否具有预测力。如果在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基础上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预测力,那么这种理论还是科学的。为了弥补其中可能出现的

① 有关米塞斯方法论的思想,除了参考史库森的著作外,还可以参阅米塞斯(2001)与其他人的一些著作。

② 科斯的原话是,“美国制度主义者们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在考虑古典经济理论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们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参阅科斯(1994,第346页)。

不足,弗里德曼引入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强调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一个理论是否科学,不是从假设与现实的相符程度来判断,而是从其预测的结论和现象的相符程度来判断。这就是理论预测力的问题。因此,理论的科学性离不开经验的检验,这些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当下的事实。无论如何,只有通过可重复经验检验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结果,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把抽象和具体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最牢固的方法论根基。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上风的关键原因。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是体现在结果上,而不涉及逻辑本身,在理论构造上还是坚持演绎推理路线的。所以,真正需要检验的不是假设,而是理论推理的结果。这种看似合理的方法论还是被悄悄地侵蚀了。首先一点是,一些非公理性假设逐步被放松,并形成了各种经济学的新领域,而这一切放松的参照系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赖以生存的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参与的数量方面、信息条件、交易成本、以及策略的互动性等,都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一一展示出来,构成了经济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但经济学家发现,仅仅对这些非公理性的假设放松是不够的,经济学需要挑战一些公理化的假设,对这些假设重新进行可复制的检验,然后才能使得公理化假定更为精确。

这场运动起始于新制度经济学。科斯本质上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但他对方法论的认识却是反新古典的。科斯曾把西方 20 世纪初形成的主流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只注重抽象的演算,忽视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如同闭门造车。科斯反复强调经济学出发点的现实性,他说,“在

当代制度经济学中,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制度出发。同样,让我们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在科斯看来,新古典对人的假定“既没有必要,也会引入误入歧途。”“当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科斯,1994,第348、349页)。科斯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他写道,“确实,一旦我们开始发现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因素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很明显需要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就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并且像我这样写散文的经济学家,将会向他们敬礼。但愿这样的日子快点到来”(科斯,1994,第361页)。自帕累托和瓦尔拉斯等人对经济学的贡献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已经运用得非常普遍,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的出版,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能够完全用一个建立在公理化体系上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达。那么为什么科斯还要说这些话呢?科斯显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模型非常不满,在他的眼中,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并不是分析现实经济行为的科学模型,因为新古典模型没有依据现实来揭示建模所需要的真实因素及其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新古典模型的出发点就是错的。这个错误在科斯看来,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假设和现实无关这一关键思想。所以,尽管科斯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基于现实的公理化体系和理论逻辑,但其继承者却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自科斯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明确贯彻了科斯的意图,把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纳入到制度分析之中,这也是经济学家首次试图从一个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公理化假定出发,来系统分析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状况。

科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看法和弗里德曼方法论的差

异关键在于,是否假设也要符合现实?科斯的回答是肯定的,经济学建模的假设条件必须来自现实,才能保证模型本身能够正确理解现实。同是需要公理化体系,但科斯的目标是假设也是需要经过反复检验的。这一点和弗里德曼正好相反。弗里德曼始终强调假设是不需要经过反复检验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从最少的几个公理出发,只要能够构建的模型能够预测现实,那么就完成了经济学的使命。这样就把经济学引向了纯粹的数学工作。因为不需要考虑假设条件的现实性,那么经济学家的智力就只能用在复杂模型的构建上,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退化为数学模型的研究,甚至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经济学被等同于数学。这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悲哀,这些经济学家们以为复杂的经济现象能够像自然界那样通过数学来准确地表达。弗里德曼肯定没有想到经济学会走向这样一个困局。当贝克尔把新古典模型运用到价格机制以外的各种社会政治领域中时,表面上看,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获得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荣誉称号,但实际上经济学在这些领域也仅仅提供了部分答案而已。

新古典经济学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有时候是非常苍白的。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了部分问题,并试图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弥补。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去讨论新古典模型赖以生存的公理化假设究竟存在何种问题,也就使得其无法在理论上走得更远。对威廉姆森等人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是,借用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包含了何种意义,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由于西蒙的影响主要在管理学领域,经济学家只是震撼于其大胆的思想,如同科斯早期的论文一样,但并不认同和接受这些思想。所以,西蒙提出

有限理性之后，并没有在经济学界引发多大的争论和后续研究。这主要就在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固守弗里德曼所解读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从而排斥了可能存在的理论上的巨大变化。

不可否认，科斯、西蒙等人不断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发起冲击，最终导致经济学家开始重视这一课题，并且也开始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来研究这些课题。^① 可以说，每一次经济学的进步都离不开方法论上的巨大争论。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当新古典经济学热衷于扩张自己的地盘时，科斯愿望的初步实现，以及西蒙的影响力开始扩展，并不是得益于经济学内部，恰恰相反，是来自经济学的外部，也就是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学的入侵改变了经济学本身！学术研究是相互渗透的，经济学也不例外。当新古典经济学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那些不受其教条束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怀疑所谓的公理，并开始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和探求这些公理的合理性，这个探求的过程就是阐述这些公理和现实相符的过程。其他学科的学者的研究也最终引起了经济学内部学者的关注，当经济学家愿意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连起手来，那么经济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所有这些变革都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继新制度经济学之后，一个真正撼动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新流派诞生了，那就是行为经济学。

^① 很明显，凯恩斯也属于从现实出发研究经济问题的，但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其方法论观点。而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上脱离了凯恩斯的基于现实的研究方法，向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靠拢。随着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断打击，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凯恩斯主义也逐渐退出了经济学的舞台，凯恩斯潜藏的方法论思想也就更不受重视了。

第二节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背景

一、行为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就是要从人的现实决策过程出发,建立符合心理学事实的个体决策模型,以此来分析具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前所述,行为经济学并不反对理论研究的演绎方法,但反对弗里德曼所说的假设不需要符合现实这一方法论观点。行为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就是假设也必须和实际情况一致。一些非公理化的假设已经按照现实来进行放松,但一些公理化的假设则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固守。行为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对这些公理化假设进行了可复制的实验,并且通过这些反复的实验发现了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数学把这些规律表达出来,从而给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提供了更科学的模型基础,也使理论更具预测力。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行为经济学所做的工作似乎涉及到一个崭新的领域。但其实不然,行为经济学所做的,不过是复活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抛弃的营养成分,并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活力。安格纳和洛温斯坦(Angner and Loewenstein, 2007)以及卡梅瑞(Camerer, 2006)在最近的综述中反复强调,行为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现象时,所用的理论大多涉及人的复杂心理状态。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对人类性质的讨论莫衷一